原典重读

梁漱溟的"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

1918年 11 月 7 日, 快要过 60 岁生日的 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25岁的儿子: "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 的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 去的。"但三天后梁济投水自尽。

父亲的发问与离世,深深刺痛了儿子-也就是被认为是百年独一见的知识分子楷模 梁漱溟。梁漱溟生于 1893 年,卒于 1988 年,去 年是他逝世30周年。若先生在世,他定然更喜 欢世人重读他的经典,而不是举办各种热热闹 闹的活动。

"这个世界会好吗",父亲的发问,既是针 对个人存在的,也是针对国家前途的,梁漱溟 一生用心于这两个问题: 人生问题与中国问 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往何处去?他主要的 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乡村建设理论》等30多部,但针对上述两个 问题,《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是其中 分量最重的两部。他放着北大教授不做,跑到 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在他看 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 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实践的。



柳友娟 制图

"思想、主张都在书里头"

《人心与人生》成书于《中国文化要义》之 后,是梁漱溟自认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动笔 是在 1960 年, 1975 年 7 月完成, 出版却已是近 10年后的1984年了。

从动笔到刊布,历时20多年,但其实构思 开始于更早的时候。据其子梁培恕回忆,1955 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时,梁漱溟就说要 写《人心与人生》,并以平静但坚定的口吻说: "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这20多年中,有10年是非常时期,非常 时期中,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感悟自然也 是非比寻常的。如果没有饱经变幻的社会政治 风云和诸多的人生挫折,这部以人生之学为主 题的著作,未必有现在的精彩和厚重,可谓愈 至晚境,所获的时代纵深愈为广大,从而屏蔽 外骛,心思凝敛,致意于很深处。这精彩与厚 重,外显的却是平淡,甚至有些艰涩的文字,以 致很多人感觉读不下去。但梁漱溟自觉担负的 "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感,恰都 集中表现在他的这最后一本书中, 书完成以 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

书的核心要旨是,人心是资借于社会交 往而发展起来,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 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 人心也自有它的发展史。梁漱溟援引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 述,就人与目然相互间的影响关系引申论述 整个人类从古至今的演化史; 继而就宗教与 人生、道德——人生的实践的命题,进行了一 番论述

梁漱溟在书中预言:人类文化的前途是西 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的崛起。其实这并非 他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1921年,28岁的梁漱 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是他个人学术 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他在书中把人生态度归 为三类: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逐求",以印度 佛教为代表的"厌离",和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 "郑重"。他认为"厌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 "郑重"是入世的最好态度。他以极大的勇气批 评新文化运动不能一味向西走,认为照搬德先 生与赛先生并不能观照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 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石。这种观点引发了很 大争议,到192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刷 了八版,可见影响之大、争议之大。熊十力曾评 价,"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 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 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 识的。"

但否定梁漱溟的也是梁漱溟自己。否定的 不是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预判, 而是意识到自己"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 解、名词来解释儒家","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 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 空话"。梁漱溟要求出版社不再加印《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并在心中萌发了另写一书以补缺 失的想法——要给中国儒家"一个说明",要把 孔子之学"找回来"。这便是写《人心与人生》一

很多人敬佩梁漱溟,是因他"三军可夺帅 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勇气,其实他更有一 种韧劲——多数人遭到批评、整肃后会停下 手中的笔、闭上自己的嘴,但梁漱溟不一样, 他依旧思索,笔耕不止。《人心与人生》一书阐 发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谆 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 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人对人应彼此 以诚相见,互以对方为重,不应以对物的态度 来对人。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传》的作者、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梁漱溟长 谈,梁漱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问家",但"假 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我的 思想、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

前途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1942年2月,梁漱溟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 文化要义》。1949年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实有二义:一是指 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其核心为儒家文化;一 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 一种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并 没有中国性,而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 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 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在 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 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 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梁漱溟从一些发人深 省的问题人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 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 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 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 而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 想的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 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

在梁漱溟那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 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 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 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时 虽然已经不像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么 着眼于构造一个建基于人生哲学的覆盖全球的 文化哲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普遍主义 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 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 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 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 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

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 36年之 后,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 习班"上作讲演,题目也是"中国文化要义"。那时

梁漱溟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 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 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 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这句话是读懂《中国 文化要义》的一把钥匙。

"行"与"知"的统-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他希望世 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他 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纵观梁漱溟一生,他从不自 昧,绝不苟且,始终求索思想,而又是传统知识分 子中少有的知行合一者。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 "行"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行",可以视作 他与《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的 "知"的统一,同样是要解决他的两大问题:人生 问题和中国问题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断定当时的中 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 "阶级的分野",因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以为 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 "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他认为,宪政应 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 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 的根本,但"根本处"所指乃是人心,因为人心是 一个大力量。

为启发这力量,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 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 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 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 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邹平,他把整个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 学起着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学校的老师和校董既 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梁漱溟希 望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的关系转 化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 是由教育所主导的话,那么社会本来可以不必有

乡村建设运动的结局自然是"无功的",既无 功于息止国共之争,亦无功于抵御外来侵略,但 还是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两笔财富。

一是一部《朝话》。《朝话》是梁漱溟在山东进 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与研究部同学 们的部分谈话辑录,或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 示启发,或对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指点,或谈论 人生修养,或讲述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学术文 化等问题, 莫不是梁漱溟切身的感悟与体认。这 份语重心长,对于今日身处浮躁社会中的我们来 说,尤为珍贵。

二是梁漱溟把他的教育观、教育方法运用到 了政治试验上,反过来,从他失败的政治试验中, 我们倒可以复原出他的教育观,却是治疗今日失 败的教育的一个良方。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 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 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 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 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 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 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 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 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 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 物"。读梁漱溟数十年前的这些评论,今日的我们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 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费孝通如此评价梁漱溟:"梁漱溟先生是我一 生中所见到的很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 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这个说真话的人 累了。



《 人心与人生 》



《中国文化要义》



《朝话》

打开瓦格纳之门的金钥匙

进入古典音乐, 瓦格纳是必经之路; 打开瓦格纳之门, 蒂勒 曼是不可或缺的金钥匙。作为当今最负盛名的德国指挥家、演 绎德奥音乐的大师,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对德意志文化的深入 理解,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对瓦格纳及其作品的演绎和研究,已 然成为瓦格纳最杰出的解读者。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素以严肃、低调、内敛、谨守德奥传统 著称,没有公开的伴侣,旅行时总带着妈妈,一位长期与他共事 的前同事形容他是"地球上最不快乐的人",同时也几乎是最神 秘的指挥家。但是,在30年的歌剧指挥生涯之后,蒂勒曼首次 以文字方式呈现他的瓦格纳人生——瓦格纳如何成为他命运 的指引,如何造就了他的音乐思想和情感,他又如何运用这种 思想与情感去阐释瓦格纳。

在《我的瓦格纳人生》一书中,蒂勒曼从职业指挥家的角 度,带领读者全景式领略瓦格纳的世界:瓦格纳的个人奋斗史, 与德国意识形态的渊源及后果,拜罗伊特音乐王国的建立与维 护,各代瓦格纳家族、乐队、指挥、导演及演员的风格与成就,每 部瓦格纳歌剧的特点和地位,各个时期瓦格纳歌剧录音版本的 优劣,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与在其他歌剧院指挥瓦格纳作品的 不同……甚至对"我们的时代为何需要瓦格纳,以及需要什么 样的瓦格纳"这一关键问题,蒂勒曼也在破除种种禁忌、神话和 误读之后,以真实、朴素的笔调,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蒂勒曼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热爱。他生 长在一个在那个时代算是条件不错的市民家庭。条件不错不仅 是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有牛至叶调味的烤鹅,更意味着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音乐相伴——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布 鲁克纳的音乐。

"无论是谁站在指挥台上,我都觉得他是一个相当可笑的 人物。这是一个什么角色?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握紧拳头,像犯了 病似的手舞足蹈?看到卡拉扬以后,我才逐渐觉得指挥看起来 与整场音乐会可以有机一体,甚至很美。"这是少年蒂勒曼对乐 队指挥最初的理解。而深刻理解并真正接受瓦格纳则更在那之 后。在蒂勒曼十五六岁之前,他听了很多古斯塔夫·马勒和理查

德·瓦格纳的音乐。相比瓦格纳,马勒更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共 鸣。然而有一天,蒂勒曼发现马勒和瓦格纳不能在他的头脑里 长期并存,他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更加肯定生命还是更 加否认生命?是瓦格纳还是马勒?他选择了瓦格纳,"虽然想听 马勒的渴望仍旧会不时地悄悄浮现, 但是即使再次面对选择, 我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选择瓦格纳"。蒂勒曼在书中写道。选择 瓦格纳,给蒂勒曼的艺术生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正是书中 谈论的主题。

一般来说,指挥家不用书面的形式表达自己。但在成为音 乐家之前,瓦格纳是诗人,他不停地写作,通过写作寻求并发现 自我。不同于瓦格纳,蒂勒曼迄今只写作了这本书,但相比瓦格 纳激情的写作,蒂勒曼的写作更深刻而理性。他剖析自己,认为 是瓦格纳造就了他今天的音乐思想和情感,瓦格纳让他直面自 己,尽管这些经验并不总是充满乐趣,却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 把他所有的感觉融为一体。这个过程使瓦格纳不同于其他也使 蒂勒曼感觉亲切的作曲家,而占据了特别的地位。

阅读这本书让我们在了解蒂勒曼的同时,也让我们通过蒂 勒曼这一特殊的视角,了解一个别样的瓦格纳。一个指挥家解 读一个作曲家的创作过程,包括作曲家和作品诠释者的创作过 程,是非常独特、有价值的。蒂勒曼以"整合"的观点去理解瓦格 纳,他认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奇迹或独特的事件,有大量的 事情我们可以知晓、理解和阐释,而这样更为客观、理性的阐 释,可以对抗一些新奇的和不准确的神话,让瓦格纳音乐的内 容与其表面的呈现不至于更加混淆。关于瓦格纳的书籍已经汗 牛充栋,而蒂勒曼这本书,虽然不是出自音乐学家、社会学家或 历史学家,却也许最为贴近一个真实的瓦格纳。

《我的瓦格纳人生》 [德]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克里斯蒂•莱姆克-马特维 著 彭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畅读

有很多"江湖经济学家"是一种低级骗子。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学过经济学,不知道什么是经济 学,或是学过经济学,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你想知道什 么,然后就好对症下药,请君入瓮。这一类骗子,我就 不再提了,只要你们稍微动动脑子,有一点点经济学 的常识,就能识破这种骗术

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的"部落",在"部 落"的内部严厉惩罚任何离经叛道的观点,对外则不 断地"侵略"。有人说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经 济学认为自己能够提供所有社会现象的唯一正确的

当然,跟其他的学科相比,经济学有着非常强的 自我批判精神。你能够搜集到一大筐关于经济学家的 笑话,这些笑话大多是经济学家自己杜撰的。能够自 嘲.说明经济学还是心理健康的。很多经济学家也对 传统的理论不满意,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试图修正原有 的理论,或是探索新的方法和领域。地火正在燃烧。遗 憾的是, 这些创新在经济学部落内部仍然受到排挤, 而在经济学部落外部则并不为人所知。

—摘自《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 何帆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在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书院,"书院"这个词, 最早见于唐开元年间,唐玄宗设丽正殿书院,但这是藏

书与修书的机构,与汉朝的东观、兰台相似。教书育人 的书院则始于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江 西白鹿洞书院,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 五代乱世,传统庙学逐渐荒废。北宋立国后,长 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又未兴学, 书院便填补了这个空 白。诚如宋代大儒吕祖谦所言:"窃尝闻之诸公长者,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

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

至数十百人。"北宋年间,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应

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执掌书院的 称"山长"或"洞主",大多由赫赫有名的人物充任, 大儒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主讲,吕祖谦则主持丽泽

书院诞生于乱世,大多为民间兴办,也就是俗称 的"私学",这也是早期书院特点之一。一旦官学兴 盛,即又此消彼长,明朝建国后在各地创立官学,书院

渐渐走向衰落 ——摘自《影子之城:梁思成与 1939/1941 年的广 汉》, 萧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真正的啤酒大师是埃及人。不了解各种谷物的政 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辉煌的古埃及文明。那里的生 活围绕着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高产的大麦和小麦 培育了庞大的出口市场。各级政府机构拥有高度复杂 的储粮系统,加上埃及气候异常干燥,为谷物储存并 作为货币创造了条件。储存起来的未加工的谷物既作 为货币,也作为贸易商品,而面包和啤酒则成为社会 各阶层的支付手段。丰收的谷物必须上缴统治者和政 府官员,他们负责将粮食通过奖励系统下发给规模庞 大的劳动者和侍从。书记员的责任是开发一套系统, 使一壶壶啤酒、一条条面包和各种未加工的谷物得以

每个社会阶层的埃及人都会饮用啤酒。据说, 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Ⅲ) 将啤酒奉为高贵的饮品,以金杯盛酒与客人同饮。 在埃及帝国全盛时期, 无论节日还是日常用餐,啤 酒都是首选饮品。直到很久以后埃及被罗马帝国征 服,葡萄酒才流行开来,取代了啤酒的地位,更受埃 及贵族的青睐。然而,即使在那时,啤酒也是埃及民

--摘自《啤酒经济学》,[比]约翰·思文 等 著,

王烁 译,中信出版社